

近代爱国诗选

鲁歌 魏中林



87
I226
163

3

JIN DAI AI GUO SHI XUAN

近代爱国诗选

鲁 歌 选注
魏中林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五·呼和浩特

B 388000

近代爱国诗选

鲁歌 魏中林

*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

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内蒙古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4.625 字数:408千

1986年8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统一书号:10089·352 每册:2.10元

乾坤留正气 诗歌唤国魂

——《近代爱国诗选》前言

鲁歌

爱国主义是我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脍炙人口的篇章，不绝于世。《秦风·无衣》、屈原《离骚》著称于先秦，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的诗词蜚声于中古。这些诗篇，都曾激励着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为保卫祖国、抵御外侮而英勇奋斗起了积极作用。但是，《无衣》的作者所爱的是春秋时代的秦国，屈原所爱的是战国时代的楚国，陆游、辛弃疾所爱的是宋金对立时的赵宋王朝，文天祥所爱的是处于易代之际的南宋。如果就整个中国或整个中华民族的意义来说，似乎他们所爱的又不是全中华民族的完全意义的中国。因而，他们的爱国诗歌似乎也不能说是完全意义的爱国诗歌。

当然，“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构成国家的种种因素的不同，国家概念的不同，表现在诗歌上的爱国主义也会有其不同的内容和性质。我们不能超越历史的限制苛求古人，也不能不顾历史的具体条件以今天的标准衡量古代的作品。在历史上还没有出现整个中华民族遭受外来侵略、出现整个民族危机之前，这

些具有正义性质的悲歌慷慨、气壮山河的诗篇，都是我们祖国诗歌史上的瑰宝，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古代被称为爱国诗人如刘琨、岳飞、辛弃疾等为志在恢复中原汉族统治政权而写的诗歌，同样受到历史上许多少数民族诗人的吟诵赞赏。今天，这些古代爱国诗歌仍然被当作鼓舞我们热爱祖国的号角。

然而，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爱国诗歌与古代爱国诗歌比较起来，却有显著的不同和历史性的进步。

首先，如我们前面所说，古代爱国诗歌还不能说是全中华民族的完全意义的爱国诗歌，但自从鸦片战争帝国主义敲开了闭关锁国的古老的中华帝国的大门，中华民族全体成员第一次感受到大规模的深入的外来侵略，因而也第一次为了一致的利益自觉地站在同一立场上进行抵抗，除了极少数汉族奸卖国贼外，组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民族成员，没有不拿各帝国主义当作共同敌人的。所谓“夷夏之防”也就改变过去用于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意义而成为中国抵抗外来侵略的口号。“祖国陆沉人有责”（秋瑾《感时》），因此，不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诗人都拿起笔来从事爱国诗歌的创作。仅就我们这部诗选所列为数极其有限的作者，不仅有张维屏、魏源、黄遵宪、秋瑾等汉族诗人，也有延清、三多、海钟等少数民族作者。“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有感》），他们所关切的是当时全中国四万万人的命运。“我朝况全盛，幅员二万里”（朱琦《感事》），“泱泱我中华，廿二行省为一家”（梁启超《爱国歌》），他们所保卫的是祖国“纵横二万里”的大好河山。“一战直须霸地球”（三多《拍案歌》），“二十世纪新世界，雄飞宇内畴与伦”（梁启超《爱国歌》），他们所盼望的是中国在上

的腾飞。他们的爱国是具有全民族意义的。虽然在晚期的革命党人如秋瑾、柳亚子等人诗歌在爱国中带有反满内容，但也由于清王朝对内实行封建专制镇压人民和实行民族歧视以及对外卖国投降而引起的，主要打击目标是满清王朝贵族统治集团，诗歌主题仍是爱国。因此，近代爱国诗歌就比历史上任何爱国诗歌更能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

其次，近代爱国诗歌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站在中国人民立场，而不是立足于某一封建王朝或某一统治阶层，更不是对某一封建君主的愚忠。辛弃疾的“壮词”不过是为“了却君王天下事”（《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岳飞的“怒发冲冠”（《满江红》）所恨的是他作为臣子的耻辱，所以他不惜听命于皇帝无理的金牌召唤而放弃已经在望的胜利。近代爱国诗歌尽管在早期也有一些忠君爱主的语句，但多是泛泛地以君主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且常带有反讽意味；而更多的是直捷了当地对最高统治者皇帝丧权辱国的斥责。如果说，张维屏的“如何全盛金瓯日，却类金缯岁币谋”（《三元里》），还是比较委婉地表示对朝廷屈辱求和的谴责，那么，张仪祖的“竟尔和戎将地割，是谁揖盗又门开”（《读史有感》），则是明明白白追究到最高统治者的责任。如果说，魏源的“已闻社鼠神丛托，那望鲸鲵澌渤攘”（《寰海十章》），还是将目标指向依附皇帝的佞臣，那么，张际亮的“石马昭陵烦北望，太宗兄弟总纵横”（《迁延》），则是以古今帝王对比，撕破了“天子圣明”的表象，而谴责当今皇帝的庸懦无能了。至于民主革命派诗人，他们革命的目的就是推翻帝制，建立民主，他们诗歌中的爱国感情更与封建愚忠完全背驰，自不待言。

第三，由于中华民族所受外来侵略灾难的深重和更多知

识分子的觉醒，近代爱国诗歌作者的广泛和作品的众多，也远非历史上任何时代所可及。在以往年代，爱国诗人和他们的作品，固然史不绝书，而近代爱国诗歌的数量之多则是空前的，仅在阿英所辑《鸦片战争文学集》、《中法战争文学集》、《中日甲午战争文学集》、《庚子事变文学集》和《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就辑有数百位作者写的数千首反映这几次事件的诗歌，这些诗歌几乎全应属于爱国诗歌范畴。当然这只是浩如烟海的近代爱国诗歌中的一小部分。我们这部诗选限于篇幅，不得不筛选再三，但也多少可以看到它的广泛性。作者有上自封疆大吏，如林则徐、左宗棠、彭玉麟等，下至小知识分子，（当然一定会有更多的民间作者的作品和民歌我们没有能够收选进去）。他们的政治态度尽管不同，有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的保守派，有的是君主立宪派、保皇派，有的是民主革命派，有的甚至是早期共产主义者；有的人对农民起义采取敌视态度，甚至镇压过农民起义；他们所属的文学流派尽管也并不一样，但在爱国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这就使得近代爱国诗歌的创作具有空前的广泛性。

第四，人民群众力量的被认识，是近代爱国诗歌有别于以往爱国诗歌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以往爱国诗歌中歌颂的或寄以期望的人物，无非是汉武、唐宗、霍嫫姚、班定远之类英主名臣，人民群众只是作为遭受亡国苦难的受害者或盼望英雄人物为之解救倒悬的小民在诗歌中出现。“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闻道中原遗老，常南望，翠葆霓旌”（张孝祥《六州歌头》），“神州陆沉，问谁是一范一韩人物？”（胡世将《酹江月》）在这些诗词里，是看不到人民群众有任何作为的。

而在近代爱国诗歌里，人民群众、下级官吏士卒却第一次作为爱国英雄而被热情地加以赞颂。老诗人张维屏的《三元里》一诗描绘三元里乡民抗英斗争，一开头就以“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因义生愤愤生勇，乡民合力强徒摧。家室田庐须保卫，不待鼓声群作气，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乡分远近旗斑斓，什队百队沿溪山”这样波澜壮阔的场面和风雷浩荡的声势，展现了群众斗争的巨大威力。避居乡间的梁信芳也在《牛栏冈》一诗中描写十三乡的乡人“牛栏冈前愤义盟”的情况：“计不旋踵不反顾，联络一心同死生。男女弱冠频请缨，女能执爨愿以征，纛锄袂袖露拳掌，主伯亚旅步伐明，一一皆可称雄兵。”满族诗人海钟的《赫哲烈妇歌》还写了几位赫哲族妇女抵抗帝俄侵略者的事迹。人民群众这样齐心合力，团结一致，在鸦片战争诗歌中，是有很多表现的。“同仇敌忾士心齐，呼市俄闻十万师^①”（《寰海十章》），魏源仅以十四个字就概括了人民群众揭竿而起的声势。陆嵩则叙述了乡民们对侵略者的藐视和制伏侵略者的办法：“乡农为我言夷人，非是虎狼乃鹿豕，困虽犹斗走无险，苟有长绳不难缚。……抛江^②屡试贼胆裂，不敢犯村敢犯郭。”（《赠龚蓝生照琪大令》）“不敢犯村敢犯郭”，正以予侵略者沉重打击的乡民们与拥兵自重、龟缩城中怯懦无能的官吏将帅二者对比，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力量。这种对人民群众英雄集体的歌颂，在以往的爱国诗歌中

^①按这两句诗有异文，一作“揭竿俄报郅支围，呼市同仇数万师。”这里据《射鹰楼诗话》引。义同。

^②捕捉侵略者将其沉入江心，乡民称为抛江。

是很少出现的。与历史上爱国诗歌歌颂的大都是英主贤臣不同，近代爱国诗歌的歌颂对象还有不少低级官吏、下层将士。贝青乔在《军中杂诗》所咏的都是县丞、典史、守备乃至捕役、水兵、乡勇头目、军队向导等人；特别是在鸦片战争宁波战役中英勇杀敌的大金川少数民族土司、土守备和屯兵，更受到诗人热情的赞颂。中法战争中，跟随冯子材“奋挺大呼”“同拼一死”的五千士卒，也受到了作为“诗界革命”旗手黄遵宪的赞誉。不仅如此，在爱国这一共同标识下，过去诗人词客从来不曾当作正面人物来表现的下层社会人民，甚至处在极卑贱地位的“盗贼”、“偷儿”、“乞儿”也在近代爱国诗歌中以为国抗敌的面貌被诗人赞许。朱琦的《纪闻》写“盗”的地位的变化：“昔日盗弄兵，今日往击贼，铁缆沉巨舰，鬼方黯无色”，徐时栋的《鬼头谣》刻画了群偷袭杀英国侵略者的机智巧妙，贝青乔《咄咄吟》里记载了一群梁上君子勇敢击杀敌军的事迹，这些，在以往的爱国诗歌里是很难找到的。至于一些江湖市井之徒，过去只被当做报恩复仇豪侠之士来描写，而在近代爱国诗歌中则也被赋予爱国者的形象。“突闻袒臂市中呼，竟有人才在狗屠”（张仪祖《咏史》），张仪祖所说的“狗屠”已不是仅仅以死报知遇之恩的侠士，而是以死报国的爱国志士；张维屏《三将军歌》中所写夜负爱国将领葛云飞遗体而出的义士徐保，就是黑水党的首领。由于对人民群众力量的认识，近代爱国诗人觉悟到清王朝腐朽的政府和腐败的官兵不足以抵抗侵略，而将希望寄托于团结起来的人民群众。“金甌只仗黎民保”（苏廷魁《有感》），“第一干城仗义民”（陶梁《感事》）。陆嵩甚至提出既然官兵不能抵抗侵略，不如“先议裁官兵”，“贼如再来集我民，给以金帛喻以诚，自保乡里卫妻

子，何忧众志成城”（《赠龚蓝生昭琪大令》）。朱琦认识到“忠义乃在民，苟禄亦可耻”。因而提出“古人重召募，乡困良足倚”（《感事》）这样把劳动人民组织起来的主张。这在以往爱国诗歌中是不可能提出的。

第五，近代爱国诗歌与以往爱国诗歌又一不同之处，在于如何处理个人感情的抒发与国家民族兴亡感之间的关系。诗歌，尤其是抒情诗，总离不开个人感情的抒发。爱国诗歌由于所抒发的个人感情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相联系所以有别于春怀秋感别恨离愁之作。近代爱国诗歌与以往爱国诗歌在这点上是一致的。但是以往爱国诗歌大都是抒情短章，而近代爱国诗歌则出现很多叙事长篇，如张维屏的《三元里》、《三将军歌》，朱琦的《感事》、《关将军挽歌》，黄遵宪的《冯将军歌》、《台湾行》等，由于客观叙述史事多，抒发个人感情成分就不显著。再则，以往的爱国诗歌虽然将个人感情包孕在家国兴亡之感中，但这些个人感情的流露却往往与个人怀才不遇、功名未遂的感慨相联系。“当年万里觅封侯”，陆游的志在恢复中原是与他“封侯”愿望一致的。岳飞虽然立志“精忠报国”，但他所感慨的仍然不离开“三十功名尘与土”。而在近代爱国诗歌中，诗人的自我感情往往被隐没，而更多地直接抒写家国兴亡感。“诗人慷慨赋同仇”（《三元里》），张维屏所慷慨而赋的不是自己老而不遇，而是人民的举国同仇。“椎秦不成奈若何”（《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入上书……》），康有为的感叹是针对列强侵略。

“浊酒不销忧国泪”（《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秋瑾的所要消除的是忧国之泪。谭嗣同和丘彦甲都在诗中写了“春愁”：“世间无物抵春愁，合向苍冥一哭休”、“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然而他们的春愁既不是

无病呻吟，也不是由于功名勋业的未就，而是“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谭嗣同《有感一章》），而是“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丘逢甲《春愁》）。尤其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党人，他们视死如归，“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章炳麟《狱中赠邹容》），“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邹容《和西狩》）“海枯石烂乾坤灭，无为瓦全宁玉折”（周实《拟决绝词》），“愿播热血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宁调元《感怀四首》），“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徐锡麟《出塞》），这些诗句，也都是作者感情的倾泻，但他们“思宗轻富贵，为国作牺牲，只强同族势，岂是为浮名”（秋瑾《寄徐寄生》），哪里有向往个人功名勋业的影子呢？

第六，在诗歌中充满必胜信心，这是近代爱国诗歌又一显著特色。正由于上面所说，以往诗歌史上的爱国诗人往往在关怀国家民族兴亡中夹杂着个人建功立业的思想，而他们又往往处于易代之际被取代的行将覆灭的王朝一方，因此不论在国家和个人两方面，这一目的又很难达到，大厦将倾，恢复无望；书生老去，功名未立，所以不论如何壮志凌云，在诗歌中充满了爱国豪情，而最后终不免发出悲凉的感慨甚至绝望的慨叹。辛弃疾“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铁骑渡江初”，是够豪壮的了，然而，最后怎么样呢？他只能感叹“春风不染旧髭须”，并且“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取东家种树书”（《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陆游的“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意气也是雄豪的，但是“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他只能“心在天山，身老沧州”（《诉衷情》）。个人如此，国家事又何不如此。所以陆游在临终之际，只能感到“万事空”，而发出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勿忘告乃翁”（《示儿》）这样寄托他渺茫希望的诗句。而近代爱国诗人，则由于他们认识到时代前进的步伐，又多半不是出于个人功业成就的考虑，因此在诗歌中就很少流露这种衰飒的情怀。即使在鸦片战争时期，封建思想仍然笼罩诗坛，进步的政治理想还没有在诗人头脑中占据地位，他们也认识到整个中华民族抗御外敌的无比正义性。即使如林则徐在功业失败遭受谪贬的时候（辛弃疾还没有遭到这样沉重的公然的打击），在他的诗中仍然没有消沉的情调，“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他还是那么决心坚定；“关山万里残宵梦，犹听江东战鼓声”（《次韵答陈子茂德培》），他始终不忘战斗。康有为在第一次上书皇帝请求变法为顽固派所阻未能上达，并且遭受旧派人物嘲谤而出京时，仍然意气风发地写道：“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

（《出都留别诸公》）。至如民主革命派诗人，他们的意志更坚，信心更足。“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秋瑾《黄海舟中日人索句并见日俄战争地图》），“再见却知何处是，茫茫血海怒翻花”（赵声《赠吴越》），他们慷慨赴死，相信革命将会胜利。“风雨潇潇频眺望，光明一线漏神州”（宁调元《题〈神州日报〉周年纪念次哀蝉韵》），“百年以后谁雄长，万事当前只乐观”（马君武《京都》），他们在斗争中相信前途定有光明。

最后，还有一点是以往爱国诗歌所不能比拟的，就是近代爱国诗歌与先进的政治理想的联系。以往的爱国诗人所向往的无非是国家强盛，宇内澄清，收复失地，恢复故土，争正统，存汉朔。他们最高的政治目的，不过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千百年

封建思想的熏陶，千百年封建传统的浸润，使他们只能留恋过去，向往唐虞盛世，而不可能放眼未来，开拓理想境界。鸦片战争敲开了古老的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的大门，欧风美雨，侵袭神州，各种新思潮争涌而入，激荡着中国社会。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是抱残守缺不足以图存，非迎头赶上实难以救国，因而爱国诗人们所写的诗歌就带有明显的冲破固有传统的先进的思想内容和政治目的。就在鸦片战争期间，当时的爱国诗人还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统治的维护者，但他们中已有一些睁眼看世界的人物。龚自珍在鸦片战争之前已发出“九州生气恃风雷”而希望打破“万马齐喑”局面的呼喊（《己亥杂诗》）。林则徐也已感到了解世界的必要，主持编纂《四洲志》，但还没有来得及在诗歌中反映。而受林则徐之托撰写《海国图志》的魏源，他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却一再见于吟咏。“欲师夷技收夷用”（《寰海十章》）、“夷情夷技及夷用，万里指掌米沙如”（《都中吟·筹善后》），类此诗句，在魏源的诗作里是屡见不鲜的。当然，早期的近代爱国诗人还只知道不能闭目塞听，要了解西洋，认识世界，但对如何吸收欧美先进的政治思想社会制度来改造中国这一点是不明确的，所以在他们的爱国诗歌中还没有看到提出明确的政治改革的主张。随着社会政治几次重大事变，欧美日本的资本主义思潮大量输入，诗人的爱国主义诗作便出现了与以往爱国诗歌明显不同的政治改革的内容。不论是在已有制度上的改良，还是推翻旧制度的革命，都在旧的思想基础上前进，对旧的传统束缚的突破，他们在诗歌中把炽烈的爱国热情与新兴的政治理想结合起来。“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康有为《与菽园论诗》），这虽然主要是指诗歌的艺术风格和语言技

巧，但也包括了思想内容的“异境”。当然，由于诗歌的篇幅、格律种种限制，作者的政治理想不可能表述得晓畅透彻，但黄遵宪的不少长篇歌行和纪事组诗却直捷了当地介绍了新的事物和文化，表现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至于更多的抒情短章，尽管不可能象散文那样宣传阐述，但简练概括的词语可以表达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变革社会的理想，不管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在他们的爱国诗歌里都提出了一些表达先进思想的口号：“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喻新知”

（梁启超《自励》）、“力填平等路，血灌自由潮”（蒋智由《卢骚》）、“千万亿年重九日，自由花发好提壶”（周实《民立报出版日少屏索祝》）、“但使江东王气在，共和民政自千秋”（柳亚子《题太平天国战史》），这些自由、平等、民权、共和等代表新思想的政治口号，同样见于维新派诗人和革命派诗人作品。他们的理解并不完全一致，仅仅这些口号也不能完全反映诗歌的思想内容，但对实际政治斗争确实起过一定的宣传鼓动作用，如资产阶级改良派诗人蒋智由的“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两句，经民主革命派的邹容在《革命军》一书中引用，对当时革命斗争却起了广泛影响。几千年来爱国诗人所用的豪语雄词，大多陈陈相因，了无新意，只有到了近代，才新词迭出，蔚为奇观。当然，新的先进的思想主要不是表现在新词语的运用。近代爱国诗歌中蕴含新的政治理想，使我国爱国诗歌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的思想内容。

综上所述，近代爱国诗歌在我国诗歌史上第一次以全民性的完全意义的爱国诗歌面貌出现。它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富强、人民自由解放的内容，具有无可争辩的正义性；它充溢着民族自豪感，但没有恃强凌弱的大国

沙文主义情绪。它在表述的广度深度以及现实主义程度上都是以往爱国诗歌所不可比拟的。当然，我们不应该抛开具体历史条件来评述古人，古代爱国诗歌所以有如我们前面所说的不足之处，主要是由于他们所受历史条件的局限；而近代爱国诗歌，如果以现代诗歌创作的标准来衡量，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也有不少可以非议之处，（这点，我们后面将加以论列）。我们历史主义地看待文学遗产，它们同样都是永远光照人间的。但是，由于时代的接近，近代爱国诗歌比起以往爱国诗歌来对我们更具有现实意义。在当前我们为祖国腾飞世界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时候，这些近代爱国主义诗歌无疑是很好的教材。为此，我们不揣浅陋，编选了这部《近代爱国诗选》，以期以古为今用的立场对爱国主义教育尽一份微薄的力量。

由于目前在文学史分期问题上存在着不同意见，“近代”这一时间概念还有分歧。我们这部《诗选》暂依通常的说法，所选基本上是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八十年之间的作品。而且从我们上述近代爱国诗歌有别于以往爱国诗歌诸特点，也是从鸦片战争才开始这些诗风转变的。没有鸦片战争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这个古老的闭关自守的帝国的大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虽然也会逐渐地缓慢地趋向崩溃，但不可能发生那样疾风骤雨似的急速的、巨大的变化。从诗歌上反映得最为直接。老诗人张维屏在鸦片战争前后诗风的转变便是十分明显的例证。而到了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诗人们反映时事便不再以古典诗歌形式作工具，那些还是用古典诗歌形式创作的诗人，除了极少数仍然以爱国为主题外，大部分都浸沉留连光景，吟风弄月，回味已经没落的岁月之中去

了。因此，以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八十年为断限，对于爱国诗歌这一领域来说，是完全恰当的。

但在这八十年间爱国诗歌的面貌也不是始终如一的。随着时代的推移，社会政治的变革，近代八十年间，爱国诗歌也有自己诗风的发展变化。

鸦片战争时期，爱国主义诗歌主要是从各个方面来反映这场战争。面对着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向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大清帝国竟然屈服于从海外远来的蛮夷之邦的一旅之师，向他们屈膝求和，割地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莫大的耻辱；侵略者的残酷暴行，更激起中华儿女无比的愤慨；腐朽的清王朝在这场战争中也充分暴露了它的统治阶层从上到下昏庸无能而又残民媚敌的真实面目。稍有血性的诗人，不能不对此激起强烈的民族义愤。不论是象张维屏那样饱受封建正统诗风影响创作清雅平淡诗篇的老诗人，还是象朱琦那样坚持地主阶级立场尽忠王室的封建王朝殉节者，也不论是象林则徐那样清王朝的封疆大吏，还是象魏源那样睁眼看世界立志于变革的经世致用派思想家，也不论是象张际亮那样一生过着浪游生活在人们心目中的狂士，还是象贝青乔那样亲身参加抗英斗争有过军旅生活的幕客，他们思想立场不同，生活经历各异，但都围绕着鸦片战争写了不少爱国诗篇。从鸦片贸易为祸中国揭示这场战争的起因，反映侵略者屠杀劫掠的野蛮暴行，歌颂英勇斗争抗敌御侮的人民群众，赞扬守土卫国壮烈牺牲的爱国将士，谴责卖国投降的清廷官吏和清军将帅，抒发个人平夷报国壮志，这些构成这一时期爱国诗歌的主题。

这一时期爱国诗歌的创作，主要出发于诗人们面对外国侵略而引起的爱国激情，他们对如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积弱衰微的国势以抵抗外国侵略，除了象魏源等少数思想比较开

明的知识分子，提出学习西方、了解世界，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外，绝大部分诗人是不能从政治思想社会制度上找原因并提出疗救之方的，而且根本没有触动封建制度。对清政府的谴责，也多半止于昏庸怯懦贪残奸佞的官吏将帅，对最高统治者虽隐有微词但有时还存在一定的幻想。总之，鸦片战争时期的爱国诗歌，冲破了乾嘉正统诗风，形成了以关怀祖国兴亡、着眼社会现实为特征的近代现实主义诗风的转变，对八十年的近代爱国诗歌起了开创性的作用。这些诗歌风格不一，或慷慨激昂，或悲凉沉郁，或自由奔放，或嬉笑怒骂，要皆以爱国为指归。作者大都在诗歌创作上涵泳功夫较深，因此艺术水平也较高，而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思想高度则有所不足。

鸦片战争不久，太平天国起义震撼了中华大地，席卷了东南半壁。起义将领多半出身草野，他们以全部精力从事实际革命斗争，不可能有余力创作诗歌，即使有些诗歌，在战乱中也很难流传下来，除了个别领袖如洪秀全、石达开、洪仁玕等偶有抒发革命壮怀的诗作，再就是一些类似宣传口号的政治鼓动歌谣外，看不到多少作品。而在清廷统治地区的诗人词客，他们大都投入与人民为敌的营垒，不可能有什么爱国诗歌的创作。一些曾在鸦片战争中写过爱国诗歌的诗人，如朱琦、鲁一同、金和等，这时出于他们地主阶级立场，也把他们的笔从反侵略斗争转向反农民起义。因此，在这一时期除了民间歌谣外，爱国诗坛是比较沉寂的。但由于同一时期有英法联军入侵和沙俄在东北的侵略等事件发生，有一些关心国事的诗人和老一辈作者出于忧国忧民的心情也还写了一些爱国诗作，但为数较少，而昂扬奋发慷慨悲壮之气也较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诗歌逊色多了。